

# 去年在鄂居家隔离50天办了50多件案子 “身边的典型”今年要体验宁波年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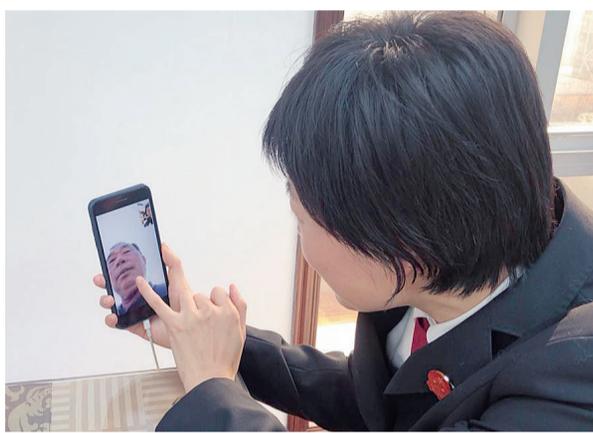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邵珊珊

“去年是回不来,今年是回不去……不过,在第二故乡过年也不错。”宁波市鄞州区法院法官黄文娟笑着说。这几天,她在忙碌工作的间隙,和家人一起置办了不少年货。

为响应“就地过年”号召,黄文娟和家人商量后,决定今年留在宁波,“来这么久了还没感受过当地的年味,今年要好好体验下甬派春节!”



去年居家隔离期间黄文娟线上办案



黄文娟向父亲视频通话

## “身边的先进典型”

黄文娟的老家在湖北省天门市,爱人是隔壁镇的。两人都在宁波工作,公公婆婆也过来帮着照顾一双女儿。“除夕前几天,一家人赶回老家,走亲戚、吃团圆饭,年年如此。”黄文娟说,不过去年春节,全家人的行程被疫情打乱了。

“回到天门不久,武汉就封城了,很快湖北就进入紧急状态。”回忆起一年前居家隔离的日子,黄文娟说最大的感触是焦虑,“既定的开庭案件要是延后,势必会影响到后面的工作,就像学生没完成作业一样,令人焦虑。”

线下不行就转线上,没电脑就找邻居借,没无线就打开手机热点,没手机支架就用卷筒纸芯做一个……2020年2月7日早上8:30,黄文娟找出家里一件旧西装,准时坐在湖北老家的电脑前,开始了疫情期间自己的第一次线上开庭。

“在湖北居家隔离的50天过得很充实,忙于案子

根本无暇顾及及其他。”黄文娟说。经统计,那50天里她利用移动微法院办案50余件。

不久前,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省高院长李占国作省高院工作报告时提到了黄文娟,肯定她抗疫期间克服困难坚持办案的做法,称赞她为“身边的先进典型”。“很意外也很开心。”黄文娟不好意思地说,“法官办案是分内事。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法院人都会和我一样,甚至做得更好。”

## 格外关注因疫情引发的纠纷

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黄文娟对因疫情引发的纠纷格外关注。

她经办过一起因疫情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按照合同,双方的租赁关系于2020年3月底结束。但2020年1月底时,租客通知房东想提前解除租赁关系,房东同意了,表示租金须计算到实际搬离之日止。之后碰上疫情,租客实际于3月初腾退完毕,但

租金只支付到2020年1月底,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租客诉至鄞州区法院,认为延期腾退系疫情造成,2月份的租金不应让他负担。房东则提出反诉,要求租客承担2月份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等。案件审理中,黄文娟释明了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政策规定,建议双方共同承担损失。在她的耐心解释下,最终原告被告达成一致。

“经历过那段居家隔离的日子,人会变得更豁达。”黄文娟说,这样的心态也有助于在审理案件、调解纠纷时疏导当事人情绪。前几天,她办理一个案子,双方在吃饭过程中因为争夺一张凳子打了起来。“他们都憋了一口气。调解时,我说这样的事跟疫情比起来,真的不足挂齿。听了这话,双方当事人都不再争了,很快就握手言和。”

## 就地过年是为了更好地团圆

“爸,我们今年不能回家看你们了,你会想我不?”近日,黄文娟拨通了老家父亲的视频电话。“当然想咯。去年就没安生过个年,今年又不能回来……”听了父亲的话,黄文娟安慰道,“就地过年也是为了疫情防控大局,相信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很快就能见面。”父亲这才笑了。

黄文娟说,她和老公平常忙于工作,今年春节打算多陪陪孩子。“去年过年虽然和孩子朝夕相处了50天,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黄文娟说,那段时间自己每天都准时线上开庭,为专心办案,一到点就把孩子赶出房间,“觉得有些对不起孩子”。

今年春节假期,黄文娟已经安排好了。“带孩子们买了年糕、汤圆、海鲜等宁波特色年货,准备带他们去看电影、逛街,好好感受下宁波年味。”黄文娟说,就地过年,是为了更好地团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终将战胜疫情,“到时再回老家看望爸爸妈妈”。



# “作业手机打卡”“线上布置任务” 家校良性互动岂能依赖手机?

新华社 颜之宏 冯松龄 余俊杰

因痴迷手机而影响学习,甚至于自毁前途者大有人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这则消息的发布,意味着教育最高主管部门已明确表态,要对纠缠多年的家校“手机大战”问题“动刀”。

“小孩子还没放学,就有家长在群里‘打卡’说线上作业完成了,这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吗?”说到学校利用手机布置的线上作业,杨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临近考试,孩子的课业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家长工作繁忙,老师布置的线上作业一下子变成了家长的作业。”据杨先生介绍,自己的孩子在福建某中学毕业班,“明明在学校能够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回家抛给家长?过去读书没有手机,也没见孩子和家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他说。

“不允许在课堂玩手机”“一旦发现就要没收”……实际上,该正式文件颁布之前,许多中小学早已对手机进行了管理,但偷玩手机的情况仍屡禁不止。

“我在讲台上上课,讲台下方经常有手机铃声响,学

生们哄堂大笑,被发现的学生也十分慌乱。”不少老师的口述中,记者发现,台上讲课台下响的情况在一些中小学普遍存在。

也有不少家长把矛头指向了学校。一名要求匿名的家长说,学校老师要求家长下载某些“作业类”App,并在App上给孩子布置线上作业,要求家长监督完成。而完成作业后查看答题分数或排名,需要充值才能实现。“了解情况还要充钱,是何道理?”

记者也发现,由于许多家长工作繁忙,无法把作业内容准时传递给孩子,导致这些家长只好把一部手机给孩子。北京市一名中学家长抱怨,疫情期间孩子上网课只能通过手机、平板,而自己工作本来就很忙,根本没时间监督,只好给孩子手机,导致孩子后来对手机拿得起放不下,而当自己发现这个问题再去要手机时就很难,也影响了母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知》要求学校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探索使用具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证或提供其他家长便捷联系学生的途径等措施,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

“在疫情背景下,手机布置作业在老师看来不仅方便,还安全,一些手机作业软件还能直接帮老师批改作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多种外部因素作用下,手机确实帮老师减了负,提高了老师的教学效率,但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

却忽略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手机的自控能力和线上作业完成效率有所差别,一味地借“信息化”来迎合这种趋势,一定程度加大了学生对手机的依赖,这也是造成家校矛盾的原因之一。

也有家长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孩子们的作业完全回归“笔头”也与时代脱轨。“家长需要做的是关注孩子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尽量避免孩子用完成作业为借口玩手机。”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学生家长王女士认为,老师在群里留作业初衷是为了方便孩子和家长,并不应该成为孩子总拿着手机玩的借口,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老师和家长用一些办法帮助孩子加强自控能力。

浙江某中学教师李老师认为,手机应该是拓展家校联系和学习资源的一种数字化工具,而不应成为学生或者家长的负担。李老师建议,有关部门在引导学校和老师使用手机建立家校联系时,不宜设立硬性考核指标,应将数字化手段视为辅助性工具。老师在布置作业时,应尽可能使用线下作业的方式,最大限度避免自控力不强的学生以完成线上作业的名义使用手机。

储朝晖等人建议,对于家校联系、作业布置依赖手机的情况,有关部门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制定有区分度的线上作业规划,对于中小学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不鼓励采取线上方式完成作业,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有节制地布置相应线上作业。